

河南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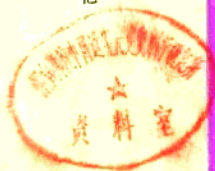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工作的回忆

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

贺升平自述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郑州见闻

从办民团到入缅作战



第 32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张仲鲁（1949年）



任访秋（1985年）



· 贺升平 (1956年)



王凌云 (1962年)

目 录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工作的回忆·····	张仲鲁 (1)
建国前的河南田赋及其管理机构·····	王竹亭 (19)
抗战胜利后杜秀升接收开封商务会经过·····	白晴峰 (27)
五十年来在治学上走过的道路·····	任访秋 (31)
回忆河岳通讯社·····	张剑石 (52)
我的老师尚天培·····	段超群 (56)
贺升平自述·····	(63)
在开封训政学院受训的回忆·····	张止宇 (73)
开封青年学社及《三民主义》之传入河南·····	王光临 (77)
王光临事迹片段·····	陈兆新 (81)
1945年至1948年郑州见闻·····	王永川 (91)
从办民团到入缅作战·····	王凌云 (121)
冯玉祥的主要谋士石敬亭·····	宋聿修 (169)
忆第一战区游击司令部干部学校·····	郭景道 (179)
在豫南挺进军的一段经历·····	田向前 (186)

〔质疑·订正·补充〕

有关民众抗日同盟会的几件资料·····	文 辉(192)
对《我与复兴社和蓝衣社的关系》	
一文的订正和补充·····	李茂永(197)

〔 补 白 〕

中国红十字会泚源分会·····	杨乃昆(18)
浚县试办新农村·····	刘式武(55)
安阳江枫剧社·····	张敬之(80)
昆明河南同乡会·····	周秀业(90)
三十二军汤阴抚恤难民·····	殷时学 司丙午(185)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工作的回忆

张仲鲁

初稿 张仲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王云五主持了这两个机构的重建工作，从这时起，他开始显露头角。记得当时他还在《东方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恢复这两个机构的经过。抗战期间，王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他又任行政院工商部长。我与王云五素昧平生，偶然的会使我与他共事两年多。但因我们始终只是工作关系，因此我对他的政治活动、思想情况、私人生活等所知甚少。现仅就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情况，以及与他所主持的部门有关的事情，回忆记述于下。

接受王云五委派，赴华南视察经济接收工作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秋至1946夏这个期间，所有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从下江（四川人把四川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统称下江）迁到四川特别是迁到重庆的机关、学校、企业等，都在忙着复员。当时我是行政院经济部的一员，家居重庆已八年之久，大有安土重迁之意，乃应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之约，拟留该校相助为理，不再作东下之计。此议甫定，而原任经济部长翁文灏适于此时转任他职，经济部改称工商部，王云五任部长。而我与王

云五素不相识，能否合作共事，殊不可知，这就更坚定了我留渝之念。但当时我的部中职务尚未摆脱，王云五忽由南京来电，促我东下，我在该部并未专领哪一部门实际工作，也不是高级人员中的什么重要角色，而王云五居然来电相邀，并嘱乘飞机前往，我一时顿感受宠若惊。这大概由于王当过多年商务印书馆老板，与教育界人士交接较多，因而知道我在各大学混过几年，才对我另眼相待吧。欣感之余，我不得不遁赴南京，听候调遣。

我到南京后，王云五召集部中高级人员开了几次会，决定派我和张貽惠（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分赴华北、华南视察经济接收工作，但孰南孰北，则由各人自行选择。去华北，主要是去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这些地方，特别是北平、天津，我是很想旧地重游的。不料张貽惠首先提出愿往华北，我又不便与争，加以华南各地包括广州、海南岛、汕头、厦门、台湾等地，我都没到过，乘此机会，漫游一番，亦为快事。王云五布置说，此番视察，是要了解接收实况，检查接收隐情。但视察哪些部门，视察步骤怎样，我概不明确，甚至连应用的表格，都事先没做好准备。就这样，我偕同工商部技士杨清海和另外一位广东人（名字记不起来了）匆匆出发了。杨清海以后转任天津工商辅导处技士和善后事业委员会技士，建国后他曾任中央煤炭工业部科长、太原煤炭设计院副院长等职。

我们首先飞到广州，那里有原经济部广州区特派员林继庸所设的办事处。广州区（包括广州、海南岛、汕头、厦门在内）的经济接收工作由林继庸一手包办。我们在广州市内的几个小厂如橡胶厂、氧气厂等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详细情形不能明了，亦不让明了。在广州停了两三天，林对我们酒席招待，视如上宾，广州市的几个大酒店如南园、西园、金城都去吃了。俗话说“吃

在广州”，真是名不虚传。但是，接收情形究竟如何，我们是渺乎其茫的，只能把林继庸的一纸报告和几张表格带回塞责。

几天之后，我们又飞到海口，这里是广州区的接收重点，设有办事分处，以原经济部矿业司技正冼闻熙为主任。林携其助手邝森扬陪我们飞往海口，盛宴招待我们后，由林、邝、冼相陪，看了几个接收过来的厂子和一些物资。在此，我们看到日军从台湾劫运过来的几千穷苦工人，住得狭隘拥挤，饿得皮包骨头，病的病，死的死，受尽了日军的残酷折磨。虽已经国民党接收，但景况仍没多大改变，屡经呼吁，始由台湾省政府把他们运回台湾。林继庸在海口停了两天，即又飞回广州。

在海口呆了两三天后，邝、冼二人又陪我们飞到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那里虽有不少接收过来的东西，然重要些的早被军政两方偷偷运走处理了。据说军方的莫某（忘其名）和琼州专员蔡劲军都发了很大的劫收财。在榆林，我们参观了石碌、田独两个停产了的铁矿，矿场上堆有大量铁砂。日本投降前，这里是日本国内冶炼钢铁所需铁砂的主要来源。田独铁矿据说藏量不大，只几百万吨，石碌铁矿那时估计藏量有一亿吨。事实上两地藏量都绝不会只那么多，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国内已在开发的著名大矿如开滦、焦作、大冶等等，都还没作过精密勘探，许多富矿那时都被视为藏量不多，或藏量将竭，不值得增加设备，扩大经营。解放后经过详密勘探，精确估算，原估藏量都大大增高。田独、石碌这两个矿场在日军撤走时，并无多大损坏，而接收后，却破坏得不象样子，连田独矿场皮带运输机上的橡胶带都被割掉偷卖了。在榆林我也曾和榆林国民党驻军某师师长蒋某在他的师部晤面，他说他不敢与驻五指山之解放军接触，只是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守住几个重要据点。驻海口的某军军长

韩练成，甘肃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进了黄埔军校，为人沉默寡言，不喜交际，据说，韩当时与解放军有互不侵犯之默契，蒋介石屡令其进攻五指山之解放军，他都托词按兵不动。建国后，我看到报载韩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后又转任甘肃省副省长。

1946年8月下旬，我们飞回广州后，又顺便到香港呆了一天。在南京出发前，谈起视察路线，王云五告诉我们路过香港要谨言慎行，不要引起英国人的反感。香港本非也不可能是我们视察的范围，但从香港搭船转赴汕头较为便捷，加上我们都没到过香港，对这个商业繁荣、华洋杂处的小岛，都想去看看，并乘此机会去购买一些日常需用的舶来品。我们到港后，受到原经济部所属中国油脂公司驻港办事处的接待，在其办公室内凑和着住了一夜，次日又在主要大街上溜了一下，只见大街上熙熙攘攘，十分繁华。当日下午，便匆匆忙忙搭船去汕头。在汕头，我们受到不在接收范围的汕头电灯公司经理高某的盛宴招待。两天后，又搭便船到了厦门。

厦门设有广州区特派员的办事机构，他们把我们安置在厦门饭店。厦门那时也已恢复繁荣，看不到多少战争创伤，尤其鼓浪屿小岛上，一幢幢洋房鳞次栉比。昔日鲁迅先生任教过的厦门大学，就在普陀寺海边。在厦门，我们仅粗略地看了一下属于经济部门接收的有限的单位，就急急忙忙登上国营招商局的一艘“国宁”号机帆船驶向台湾。本来，从厦门径直驶台湾南部之高雄港既近又快，但据说高雄海面每年八九月间风浪较大，国宁号为避风浪，不驶高雄，而驶基隆。但航程中也遇到了大风，船在海中不敢前进，为安全起见，抛锚几个小时，风止才又启航，及到基隆港，整整走了24小时。

基隆是一良港，湾入市区，岸边就有旅店、饭馆。下船时天

已傍晚，我们下船后，就在岸边一个旅店住下，次日才乘火车前往台北。在台北，受到资源委员会的招待，住在资委会的招待所。这招待所原为一日式旅馆，睡觉饮食都在地板上，上面铺着所谓榻榻米，颇为干净整齐，侍者全是青年妇女，这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我们初见颇以为异。此时，属于经济部门接收的单位和物资都已由有关部门分别经营管理起来，较大的企业（商业和银行不在内）和厂矿如金瓜石铜矿、煤矿、炼油厂、化肥厂、制酸厂、水泥厂、制糖厂、造船厂、机器厂、炼铝厂等几十个较大单位都已划归资委会经营，对这些单位，我们谈不上视察，因为资委会此时已不属工商部。在台北和基隆附近，我们参观了一两个煤矿、基隆造船厂（实际只是修理而无制造）、化肥厂、制酸厂、金瓜石铜矿等单位。抗日战争后期，美国飞机轰炸台湾，各厂矿、企业所受损失很大，只有规模较小的厂矿已恢复生产，规模较大的金瓜石铜矿（据说是东亚头号大铜矿）破坏甚重，由资委会派人驻矿保管。在我们参观的煤矿中，有一斜井，见有女工头顶矿灯，身穿短裤，与男工一道从井口出，这是我们向所未见的。到一平洞参观时，我们坐在小轻便车之藤椅上，由一青年女工将我们推至洞口，当时心中十分不安，而资本家与矿厂职员每日来往矿口，都是如此行进，习以为常。

在新竹，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一个化肥厂、一座扩建了的水泥厂、一所规模不大的纺织厂。沿台北到高雄的铁路上，我们在台中、台南等地还看了许多制糖厂，但都被美机炸得不象样子，其中只有六七所修复生产，年产量也不过七八万吨。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施行殖民地单一经济，大力发展甘蔗种植，建立大小糖厂40余座，每年出糖近百万吨。我们还看过两所规模可观的造纸厂，一处出产不大的石油矿，当时石油矿还有十来架钻机

在山坡上钻探。日月潭水电站当时只有两部电机修复运转，发电5万瓩，如全部修复可发电15万瓩。

台湾的良港，北有基隆，南有高雄。我们到达高雄时，被炸房屋多未修复，街道上虽非冷冷清清，而房屋却是稀稀落落。我们住在炼铝厂招待所（当时市内还没建起一个象样的旅馆）。这个厂亦是日本人所建，年产量1.2万吨，规模在台湾算是宏大的，但受到美国飞机的轰炸，损坏严重，正在修复。据说，资委会因财力不充，正与加拿大资本家协商贷款或合资经营。台湾当时没有铝矿，日本人统治时期，铝厂原料是由南洋一个小岛开采运来的。炼成之铝，全部运往日本使用，连一个制造铝碗铝锅的厂子都没在台湾建立，台湾人所用的日常简单的铝制器皿，都得依靠日本供应。高雄的日本海军炼油厂，规模颇大，亦被美机轰炸，损失严重，车间或全毁，或残破，我们参观时，只有很小一部分（记得是氧气厂）恢复生产，其余大部破烂不堪，尚未修复。另有一水泥厂，正在生产，尚可供应高雄一带的房屋修复及新房建设所需的水泥。

统观当时台湾全部工业，轻工业多，重工业很少，重工业的基础钢铁冶炼业则是缺门，由此也可见殖民统治之一斑。

我们在台湾视察了九天，本想多停些时日，多看一些东西，不料工商部忽来一电，叫我们即速回南京。于是我们搭客机飞沪转宁。这次赴华北视察的张贻惠，在飞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担任工商部天津工商辅导处处长

我们在台湾时，曾见报载王云五到庐山晋谒蒋介石，提出为了各地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由工商部在国内工商业中心城市分

别设立几所工商督导处，得到蒋的批准。当时我以为工商督导处一定权限很大，可以总揽各地工商业的管理大权，并幻想如果我能取得一席，当可大干一番，在工商业界一显身手。王云五回南京后，把设立工商督导处的提议拿到立法院审议，虽很快得到该院大会通过，但却把工商督导处之“督”字改成“辅”字。一字之改，关系甚大。那时一般人（包括我在内）感觉这样一改，这个机构的威权就没有了。但王云五并不因此而灰心。我们一到南京，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筹设四个工商辅导处，以工商部工业司长欧阳仑任上海处处长，我为天津处处长，刘庭芳为汉口处处长，广州处处长可能是郑丰，后来又在沈阳添设了一处，以杜春晏为处长。各工商辅导处共设职员17人（不包括工友）。在当时机构普遍臃肿庞杂、人多事少的情况下，这个机关还算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几个处长都原封不动地带着部中衔，领命各赴指定地点筹备。但王云五并没有把工商辅导处的工作范围具体说明，同地方政府类似机构的职权如何划分、怎样联系、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等，概未加以规定，亦未具体交代。这就给我们的筹备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

我于1946年11月先到北平，与原经济部特派员王翼臣接洽天津的房屋、家具、设备等问题，他概允按照工商部的意旨，把他的天津办事处房屋、家具、汽车等全盘移交，他的天津代理人李洛之执行了他的指示，于是天津工商辅导处就于1946年12月底在天津长春道正式成立工作了。处中人事安置比较简单，除接收了原摊子的几个人外，以原中央工专教务主任王冠英（留美，习电）为主任秘书，以原南开大学教授杨颐桂（留美，习机械）、原河南省建设厅纺织厂厂长高家宝（解放后任天津大学纺织系教授）为技正（即工程师），以天津油漆专家周维尧、工商部交用人员

潘浙为专门委员。

初到天津，免不了有一番酒席酬酢。首先是天津“工业之王”、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王崇植摆酒宴款待我们，当时在座作陪的除天津工商业界几个巨头外，还有开滦矿务局的实际老板英人普利耶。王崇植利用英国人在华的特权和开滦煤矿的财势，在天津广结声援，天津的许多重要事情，不管与开滦有无关系，不征求他的意见，谁也别想办，即使办也办不通。只是由于我是工商部的高级人员，又是来天津辅导工商，他表面自然要加以敷衍，但骨子里却看不起我们。因为开滦煤矿是当时国内唯一大矿，拥有雄厚资本和权势，又有官僚资本和英国人为后盾。一旦王发现这个辅导处权力不大时，他的态度便日趋冷淡。

天津辅导处开始工作后，部中仍没有具体规定工作内容。但既设了这个机构，我们就须找点事做。天津的官僚资本工业中，宋子文系统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六个大纺纱厂，属于资委会的天津钢铁厂、天津造纸厂等，都是来头很大，可以直接“通天”的，根本不容我们过问，更谈不上辅导。民族工业规模大的如永利化学公司、久大精盐公司、东亚毛织厂、仁立织呢厂、恒源纺纱厂等，亦都是长袖善舞，各有门路，既不需要我们来“辅”，更不需要我们来“导”。需要我们给点帮助且我们还能给点帮助的，是一些中小型厂。经过粗略调查和了解，我们得知东北和山西大同、河北的井陉与磁县以及山东的中兴煤矿等处之工业用煤，因交通关系运不到天津，只有邻近之开滦之煤尚可利用，但因火车车皮被国民党军队扣留，私运货物，开滦之煤亦不能畅运到天津。宋子文的六个厂神通广大，无论形势怎样恶劣，它们总可得到源源供应，而中小厂无钱无势，常因缺乏原料而告停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便与开滦矿务局交涉，每月拨一定数量的煤，交

工商辅导处，然后按需要分配给中小型厂，多者三五十吨，少者只三五吨。经过双方频繁协商，开滦才答应每月拨1000吨煤，经运输商人按分配表送给各厂，但后来我们发现运输商人有偷拿碎煤顶原煤之事，乃改发煤票，由用户自运。在分配这1000吨煤的过程中，厂方请托以及经办人员混水摸鱼之事亦曾发生。为了息事宁人，不让家丑外扬，影响机关和个人的荣誉，我们对这些人在工作上重新调配，未予以深究。

天津是我国纺织印染业中心之一，大型纺纱厂除前述官僚资本经营之六个厂外，还有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恒源纱厂等。印染厂家则更多，但规模不一，大多为手工操作。辅导处曾由高家宝联系中小厂家和布商，办了几期织染技术训练班，起了一些作用。解放后高氏能留在天津，并在大学纺织工业系任教授，与此有一定关系。

天津为国内大埠，出口贸易相当繁盛，华北各省土特产如皮毛、猪鬃、肠衣、地毯等等，每年出口数量很大。为了联系出口贸易商人，辅导处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请当地较有声誉的出口商人和有关人士参加，研究推进出口办法。但因为战争，出口行业陷于停顿，出口商人悲观消极，虽开过几次会，但只是空谈一番，无补于实际。

在这期间，为加强控制工商业，工商部曾下令对全国工商业进行造册登记，印发了大批表格，叫积极办理。天津辅导处为此特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周维尧主持。此时工商业已陷绝境，工商界走投无路，一提登记，人心惶惶，都认为这又是蒋介石集团设计的一条压榨门路，所以相率躲躲闪闪，不肯认真登记。登记造册任务很长时间没有完成，而工商部把表格发下后，亦未认真催办。

天津工商辅导处所占长春道之房，系原经济部平津区特派员驻津办事处所接收的敌伪产业。辅导处成立之前，已由资委会天津各单位管理委员会（主委马思亮）把楼下一半占用。接着行政院成立了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孙越崎（时任资委会主委）兼局长，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兼副局长，所有平津两市各方面所接收之敌伪产业，统归该局处理。我与孙越崎原本相识，辅导处占用长春道房亦曾得孙许可。几个月后，马思亮想扩张地盘，他仗恃孙越崎系资委会主委又兼处理局局长，几次威胁要占楼上辅导处部分房屋，后见辅导处坚持不让，他又转而覬覦楼下辅导处办公室，并怂恿张子奇带着两名打手到辅导处办公室晃来晃去，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及我听说后下楼与他理论时，他仍态度倨傲。辅导处电王云五请示办法，王复电囑令就地解决。后来马思亮在另一街上找了一所房子，要辅导处搬迁，辅导处不愿再与他们纠缠，已允迁让，但不知何故，他们又不再威逼而让辅导处呆下去了。

由于工商辅导处的业务活动很有限，加以时局紧张，半年之后，我就有了退志，在协助北平派来的几个学生募集了一笔捐款之后，我即到南京观察形势。停了几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征候，便又回到天津。孰知那时蒋介石已同青年党做了一笔交易，把工商部送给青年党。我回津不久，工商部长即易为青年党负责人之一陈启天。我同陈启天素不相识，就由一个旧识青年党人（忘记是谁）介绍，到南京山西路住宅区见了青年党首领曾琦。我同他接触后，感到同青年党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但又不能不去看看新部长陈启天。我见了陈启天并把天津工商辅导处的业务作了简单汇报之后，即表示辞职之意，请他派人接替，他未免安慰一番，叫我依旧供职。随陈进部担任参事的青年党人郭甄太是河南同乡，

我们又相识，我把辞意告诉他，并劝他去活动接替，他当面表示谦逊，我回天津不久，报载王云五转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即把我离津的决心函告王云五，并表示愿回南京。没隔几天，他来电相邀，我便电工商部辞去天津工商辅导处处长之职，继任处长果然派了郭甄太。

行政院处理委员会和王云五主 持的善后事业委员会

我在天津接到王云五来电后，将天津工商辅导处的事务稍作摒挡，交主任秘书王冠英代为处理，即径赴南京王云五处，他让我任善后事业委员会参事兼第一组组长，主管计划。该会副主任委员为潘序伦，潘原任工商部常务次长，是当时国内有名的会计师。第二组主管农业，组长为马保三，但马因兼任其他工作，经常住沪，不常到会。第三组主管总务，组长黄孝先，是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时的老搭档。主任秘书徐伯齐，是王的亲信。另在上海设有办事处，主任为陈世章，字聘侯，系化学家。善后事业委员会的基于人马，大致如此。

善后事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事委会）是行政院的一个直属委员会，与各部地位相埒。顾名思义，凡属国内的善后事业，似应一律归它主办。其实不然，条例规定是叫它继承善后救济总署的未竟之业，主要指导该署积存的美国剩余物资的管理与分配。但是，在行政院管辖下，已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善后物资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掌握和处理救济总署遗留下的物资，上海的银行家李铭（馥孙）为主任委员，以其他十多个上海闻人为委员，其中还有美、英籍委员。处委会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因其成立在事委会前，也不可能明文规定要它属事委会领导，但王

云五认为它当然应归事委会领导。而事实上两会不在一地，处委会掌握物资，拥有实权，会中各部门都有美国人参加工作，副秘书长是美国人麦克米伦，他大权在握，操纵一切，秘书长向景云，仰承其鼻息。我到该会联系过几次工作，也列席过一次该会会议，因而能略有所见。

处委会秘书处设在上海福州路。秘书处辖有一乡村工业示范处，以马杰为处长，贺闳为副处长（马、贺均留过美，习化学），该处的主要业务在湖南邵阳，由美籍副处长斯德沛主持。1948年8月，王云五将要卸去事委会主委，我也将随着离开该会，因事到沪，马杰给我以乡村工业示范处顾问名义（无工资待遇），适值他要往邵阳视察，约我到邵阳一游，我即与他一同飞往。我在邵阳停了两天，又同他到新化县看了一所已停产的手工业造纸厂。时乡村工业示范处拟投资使之恢复生产。而后我即取道衡阳、长沙、汉口先回南京。记得乡村工业示范处在邵阳有汽车和机器修理及小型发电厂，并兼营汽车运输业务。厂子的四周扎有铁丝网，厂内生活很好，与厂外相比，俨然两个天地。

渔业管理处为处委会的一附属机构，以赵君迈为处长。据说救济总署留下有40余只渔轮为该处保管，该处并训练渔民使用。

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也是处委会的附属机构，林继庸为总经理。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美国物资中，有些是制造农业机械的机器设备。处委会以这些机器设备作为基础，成立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公司的办事机构设在上海，除上海的总公司外，还计划在南京、汉口、长沙、广州、北平、郑州等地设立八个分公司。总公司下设一比较完备的农业机械制造厂，八个分公司设立八个分厂，由总公司从上海分发机器设备给各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投资；还计划在地方上招收一部分商股，作为地方投资，成立董事会，推